

TRANSLATION WORKS TRANSLATED, EDITED
AND ANNOTATED BY SU MAN-SHU

朱少璋 編

曼殊外集

——蘇曼殊編譯集四種



曼殊外集

——蘇曼殊編譯集四種

TRANSLATION WORKS TRANSLATED, EDITED
AND ANNOTATED BY SU MAN-SHU

朱少璋 編

學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曼殊外集：蘇曼殊編譯集四種：漢英對照 / 朱少璋編．—北京：
學苑出版社，2009.10

ISBN 978-7-5077-3445-4

I . ①曼… II . ①朱… III . ①詩歌—作品集—英國—近代—
漢、英②古典詩歌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漢、英 IV . ① I561.24
② I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9) 第 181653 號

出 版 人：孟 白

責任編輯：劉 豐

出版發行：學苑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 2 號院 1 號樓

郵政編碼：100079

網 址：www.book001.com

電子信箱：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銷售電話：010-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 (郵購)

印 刷 廠：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廠

開本尺寸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張：11.375

字 數：200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價：35.00 元

他選譯拜倫的英詩，
並探討漢詩英譯的“三昧”，
從而為中西文學結上了“因緣”，
他的呼聲有如“潮音”。

——柳無忌

序

少璋君《曼殊外集》編成，準備出版，希望我寫序言。《外集》輯錄了蘇曼殊四種編譯材料：《文學因緣》、《潮音》、《拜輪詩選》和《漢英三昧集》，集中反映出蘇曼殊在翻譯方面的成就。我也算從事過外語中譯工作，對翻譯始終感興趣，也對翻譯前輩抱有莫大的敬意；有機會表示便想表示。再說四種材料之中，包括了英人拜輪《哀希臘》詩的中譯。拜輪所哀的國土，正是我上世紀六十年代度過將近十年美好時光的所在。詩中提及的摩羅東（Marathon 今譯馬拉松）和渺邏（Salamis 今譯色拉美），我幾番經過，悵惘生情。詩中提及女詩人奢浮（Sappho 今譯薩福）的篇章和三百斯巴族（Spartan 今譯斯巴達人）死守披麗谷（Thermopylae 今譯德摩比利）的史實，我誦讀載籍，或悠然神往，或低徊悲慨。前塵非夢，禁不住想再寫些甚麼。此外，少璋君《曼殊外集》的輯集和出版，是在艱辛及壓力之下完成的。我跟他結識相處近二十年，稍知個中情況，也想講幾句話。由於以上幾點，我答應給他寫序言。

四種材料大部分由蘇曼殊從他人的譯著中選編出來，也就是說大部分不是出自蘇曼殊之手。相對曼殊本人的詩文，文學界對四種材料比較不重視，因此流傳不廣。到了今天，要集齊四部作品的困難程度，可想而知。少璋君在《前言》中雖然不曾具體說清楚怎樣困難，我相信其間必然已經付出極大的勞力。四書即使搜齊出版，人們也許還有像少璋君指出的那樣意見：譯集既非曼殊自創自作，沒有重輯重刊的必要。少璋君對此已作申辯了，不過我還想加插幾句：編選的作品不應該隨意非議，有些編選的作品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，譬如蕭統的《昭明文選》和姚鼐的《古文辭類纂》就是。兩書的重要性比起《昭明太子集》和《惜抱軒全集》只高而不低。蘇曼殊四種編譯材料誠然不必拿前人的事例比擬，但意義作用肯定是有的。

我知道少璋君這回出書承受最大的壓力，可能跟《潮音》和《拜輪詩選》二書中拜輪《贊大海》、《去國行》和《哀希臘》三詩的譯主問題有關。以往人們認為三詩由蘇曼殊譯出；近年來主流看法，認為三詩是黃季剛（侃）先生的譯筆。《外集》裏面出自蘇曼殊之手的篇章本來不多，去掉三詩，益見其少，《外集》的重要性和出版的急切性，如果有人覺得更要低打一重折扣，不算出奇。

有關三詩的譯主問題，少璋君說了不少話，我在這裏嘗試補充一些。茲從學術界普遍認為三詩譯主是季剛先生所根據的資料說起。資料如下：

(一) 季剛先生《繡秋華室說詩》：

蘇子穀作畫，極蕭疏澹遠之致，偶作小詩，亦極淒婉。景仰拜輪之爲人，好誦其詩。余居東夷日，適與同寓舍。暇日輒繙拜倫詩以消遣，子穀之友彙刊爲《潮音集》。茲錄《哀希臘》及《贊大海》二篇，愧不能如原意，然子穀云：“無大違異處。”或不相給也。《哀希臘》詩，馬君武嘗譯爲七言，今更譯之，無一字相襲也。……《贊大海》詩六章，章十二句。其第五章爲餘杭譯，蓋原義深曲，譯兩日不成，餘杭見而補之。

(二) 潘石禪（重規）先生藏季剛先生手稿，《贊大海》題作《代蘇玄瑛譯拜倫贊大海詩六章》，《去國行》作《代蘇玄瑛譯拜倫去國行詩十章》，《哀希臘》作《代蘇玄瑛譯拜倫哀希臘詩十六章》。又第一首和第三首篇末有《識語》：

昔木華、張融并作《海賦》，以彼巨筆，贊詠大瀛，此土已難再邁矣！拜倫西土詩人，其託想類情，或殊華域；而瑰詭華妙，實可嘆稱。己酉春夏之交，與曼殊同依太炎，暇日譯此，愧未能適合本意也。（《贊大海》）

拜倫此詩，悲麗深婉，所以哀憐振董亡國之民者至矣！桂林馬君嘗譯爲七言，今更譯之。侃注。（《哀希臘》）

季剛先生一則說“暇日譯此”，再則說“今更譯之”，可見譯主是誰，再也明白不過。儘管這樣，從上引資料，還是可以引出一些問題可以思考的。

首先，季剛先生詩題爲甚麼用一個“代”字？我們現

在的理解：“代”是“替”“代替”之意。甲君不做事，乙君替他幹了，好像甲君不填表，乙君替甲君填表之類。回到譯詩這回事，就是說蘇曼殊沒有譯拜輪三詩，季剛先生替他譯了，便是“代”。求之於古，駱賓王《艷情代郭氏贈盧照鄰》和《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》，可能是類似的例子。然而如果求之於古，“代”字用在詩題上，或者還有別樣的講法。鮑照很多樂府詩的題目都有一“代”字，譬如《昭明文選》卷三十一選錄的《代君子有所思》就是。此詩《昭明文選》歸入“雜擬”，跟擬古、效古、學古等詩同類。然則“代”便有模擬、學效之意。黃節注鮑參軍（照）詩，指鮑詩《代門有車馬客行》“當是擬曹植《門有萬里客》篇”，把“代”等同“擬”。這裏要指出的是：所謂“擬”或“效”，應該理解成本來有一原作，根據原作旨意或風貌再寫一首。理解“代”字也可循此方向。上引《代君子有所思》，鮑照集作《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》。鮑照也有所據，就是陸機詩。《說文》《人部》：“代，更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更者，改也。”無論是“更”是“改”，指作者文字之外另有先存文字。季剛先生深研六朝，精通訓詁，會不會不用駱賓王而參考鮑照擬題的方式，值得思考。只是參考六朝擬題下字方式的話，則邏輯上不可避免這樣推演：季剛先生的詩作實據一先存的他人著作而成。

六朝人擬作，大抵根據原作旨意或風貌，文字詞句卻是有所更改的。就以樂府《君子有所思》來說，《樂府詩集》

卷六十一《雜曲歌辭一》題下說明引《樂府解題》，指出陸、鮑二作同樣“旨言雕室麗色，不足爲久懽；宴安酖毒，滿盈所宜敬忌”。至於鮑詩的文字詞句，即使運意和陸詩無大差別，還是改了的。好像陸詩起首兩句爲“命駕登北山，延伫望城郭”，鮑詩意雖相近，但寫成“西上登雀臺，東下望雲闕”。到了唐代，擬作還出現韓愈《月蝕詩效玉川子作》那樣的例子。玉川子即盧仝，仝有《月蝕詩》。韓愈基本上用盧仝詩進行刪削剪裁的改動，成爲自己的作品。韓愈詩題用“效”字，“效”還是“擬”，還是“代”。

我們拿季剛先生手稿和蘇曼殊《潮音》或《拜輪詩選》中的詩篇互校，修辭偶有變動，文字偶有異體；但二者文字絕大部分相同。差別雖小，仍可視作韓愈、盧仝“效”作的方式。“效”和“代”一脈相通，然則詩雖效作而題目仍用“代”字，還是說得過去。

其次，蘇曼殊在《致劉三書》中說到“前譯拜輪詩”，蒙末底居士（即餘杭太炎先生）“爲我改正”。所改正的詩，看來就是季剛先生在上文（一）條中提及的《贊大海》第五章。季剛先生文中稱“譯”而蘇曼殊稱“改”，二字含意是否等同，可以探索。季剛先生說了：《贊大海》第五章“原義深曲，譯兩日不成，餘杭見而補之”。這三句話似乎可以作如下理解：譯者譯了兩天，部分譯文出來了，可是譯得不成功，太炎先生於是在原譯稿上改正補足，得以成章。當然我們也可以說：譯者試譯了兩天，一個字也

寫不出來，最後由太炎先生補譯。不過此章倘使由季剛先生開譯，很難想像兩天下來，一個字都寫不出。說是譯是譯了，但譯得不理想，太炎先生最後補改，更合情理。如果這樣，季剛先生筆下的“譯”，也許可以包含“改”義。

另外，怎樣解讀季剛先生《繡秋華室說詩》的文字，似乎值得注意。譬如上引第（一）條中“暇日輒繙拜倫詩以消遣”的主語便是。這一句的主語，人們大抵都看成季剛先生，即上兩句中的“余”。因為“余居東夷日”及其後句子，讀起來意思好像順流而下，句中人物無從置疑。這固然是一種解讀，然而也不妨從全段觀察。本段先寫蘇曼殊能詩，又景仰拜倫及好誦拜倫詩，如果接下去寫“暇日輒繙拜倫詩以消遣”，文意通暢之極。反之，如果據“余居東夷日”兩句，實在轉不出譯拜倫詩消遣的結果來。能不能考慮“余居東夷日”兩句是季剛先生回應上文蘇曼殊之筆，倒不必聯繫到下文句子去；“暇日”句的主語仍舊歸之於蘇曼殊？這般行文方式，古文不是沒有。好像韓愈《歐陽生（即歐陽詹）哀辭》，載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，宏揚文教，親近能誦書作文辭的州民。“詹於時獨秀出，袞加敬愛，諸生皆推服。”這裏次句只回應首句，三句的受語不是次句的常袞，而是首句的歐陽詹。又好像蘇軾的《方山子傳》，記蘇軾在黃州，突然遇見舊朋友方山子，問他何以到黃州來。“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，余告之故。俯而不答，仰而笑。”這裏的“余”字不連繫下句

作主語，“俯而不答，仰而笑”的主語是越過一句的方山子，彰彰甚明。

第（一）條中“愧不能如原意”至“或不相給也”四句，也值得注意。有翻譯經驗的人都知道：中外文化不同，中外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不同，許多時候原文的精微含意，中文無法完全寫出，從而有“愧不能如原意”之感。季剛先生儘管高明，碰上不能如原意的情况，並不奇怪。蘇曼殊開解說“無大違異處”，也是朋友間相慰之道。奇怪的是季剛先生“或不相給也”五字。“相給”即“相欺”“欺騙”意。按理蘇曼殊相欺不相欺，一看拜輪原文便了然。季剛先生這麼說，倒像他譯詩時沒有原文在手上。即使蘇曼殊勸慰，還是拿不準是否真的譯得還可以。“或”字傳遞的就是這番意思。“或”字同時還傳遞出一種可能性：季剛先生據先存的中譯本改譯，卻一時未參照原文，所以有點不安。當然，理論上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：季剛先生譯詩，不怎麼管原文，只憑他人口述，寫成中文，像林紓譯西洋小說那樣。不過這種情况無從證明，只能看作子虛烏有，不發生在季剛先生身上。

又譬如上引第（二）條中《贊大海·識語》最後四句：“己酉春夏之交，與曼殊同依太炎，暇日譯此，愧未能適合本意也。”從文氣的角度看，去掉第二句，應該說更暢順。季剛先生所以夾進第二句，能不能這樣推想：因為曼殊、太炎兩人和此詩翻譯有關？太炎先生補本詩第五章，與本

詩翻譯關係至明，季剛先生說了。蘇曼殊呢？他如果跟本詩翻譯無關，《識語》提他作甚？只有蘇曼殊對本詩翻譯用過工夫，才算有關係，這裏需要和太炎先生並提。

拜輪三詩的譯主是誰，我不作論定，暫時也議論不了。我只是想把翻閱兩條資料時的反應如實講出，一番嘮叨話拿來作序言，如此而已。現在《曼殊外集》快要出版了，蘇曼殊有關資料得以更完整面世，少璋君功不可沒。少璋君能詩，作風清麗靈動近曼殊一路。《外集》出版了，心情輕鬆暢悅之餘，會吟詠遣懷不？

鄭健行

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

前言：《曼殊外集》的編與譯

研究蘇曼殊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柳亞子先生，在《重訂蘇曼殊作品索引》中曾訂下了三個出版計劃，即《曼殊餘集》、《曼殊畫集》及《曼殊外集》。

“餘集”中的大部分資料已由柳亞子哲嗣柳無忌教授整理，與順德馬以君先生著手編刊一部極具規模的曼殊研究資料集，而部分資料，亦早已編入《柳亞子文集》第六部《蘇曼殊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）中。畫集的出版計劃最難完成，因曼殊傳世畫作多已散佚，小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則極難看到，更遑論製版印刷了。這個計劃，非交游廣闊、有心有力者不能勝任。我在2000年重刊了蔡守編刊的《曼殊上人妙墨冊子》，只印了五百冊，還是原書的那二十二幅，添入了新發現的鄧爾雅的題跋、翻譯了佛萊蔗的英文題詩；只此而已。至於“外集”的編刊，柳亞子在《蘇曼殊傳略》中說：“一本《曼殊外集》，包括《文學因緣》、《拜輪詩選》、《潮音》、《漢英三昧集》在內，也遲遲沒有動手。”

蘇曼殊在翻譯方面的成就，的確是集中地表現在他編譯的四種材料之上，即：《文學因緣》（1908）、《潮音》（1911）、《拜輪詩選》（1914）及《漢英三昧集》（1914）。曼殊編譯的四種材料，除小部分出自曼殊手筆，其餘均選編自他人的譯作，據柳無忌教授的查考，曼殊曾採用過以下數種譯著中的材料：

- (1) Chs Hes Budd, Chinese Poems, London, 1912.
- (2) George T. Candlin, Chinese Fiction, Chicago, 1898.
- (3) L. Cranmer—Byng, Book of odes (She King), London, 1905.
- (4) J.F. Davis,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, London, 1870.
- (5) Herbert A Giles,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, London, 1898.
- (6) Herbert A Giles,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ew York, 1901.
- (7) D. Hervey de Saint—Denys, Le Li sao, poeme du IIIe Siecle avant Notre Ere, Paris, 1870.
- (8) James Legge, The Chinese Classics, 5 vols. Oxford, 1865—1895.
- (9) James Legge, The She King;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 (trans in English Verse), London, 1876.
- (10) W A P Martin, 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, Shanghai, 1912.

(11) Wells Williams, *The Middle Kingdom*, 2vols.
New York, 1883.

姑無論是編是著，均誠如柳無忌在《蘇曼殊傳》中說“他就對促進東西方文學關係作出了貢獻”。雖然如此，這四種材料未有像曼殊的詩文作品一樣，廣泛地在文學界流傳，時至今日，要集齊這四部作品已屬難事，四種材料已經絕了版，那僅有的孤本則多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，一般讀者無由得見。

有人認為，這些譯集只是曼殊編選而已，曼殊自譯的作品並不多，因此沒有重輯重刊的必要。唯個人的看法是：編選也要具識力，而並非臚列湊拼，編選者對某個文學現象的看法，對某種文學體裁的偏好，對某些作者的推揚，往往可以在其編選的作品集中得到或明或暗的啓示，編選原則亦往往涉及幽隱的取舍意圖、文學觀或文學批評理論；凡此種種，均證明重輯重刊《曼殊外集》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。柳無忌教授在1992年3月給我的信中，就討論到《曼殊外集》出版的學術價值，柳教授認為《曼殊外集》的出版“可與馬以君的《蘇曼殊全集》同時印出，補其不足”。馬以君先生有《蘇曼殊編譯集》的出版計劃，主要是把曼殊編譯的材料分解重組為英詩漢譯、漢詩英譯、漢文英譯、英詩輯錄和漢文輯錄五項，英詩輯錄部分如《潮音》中的《英吉利閨秀詩選》則附郭應陽的中譯；《嶺海幽光錄》雖非譯文但卻是曼殊所“編”，在馬編的標準下也收入漢文

輯錄中。馬以君《蘇曼殊編譯集》的重組工作誠然令曼殊的編譯材料更具系統，但也同時把四種主要的編譯材料的系統打散了，在取捨間我傾向保留四種材料的本來面貌和系統，讓研究者有機會接觸到材料的原始面貌。馬以君先生也非常支持《曼殊外集》的編刊計劃，我們幾經討論琢磨，都同意刻意不迴避部分內容重複的現象（如《拜倫詩選》與《潮音》的內容重複，但文辭有少異處），務求把這四種材料的原本、完整的面目加以保留。

《曼殊外集》的編刊，在理想計劃中應包括《娑邏海濱遡跡記》和《慘社會》，唯以此兩種譯作於曼殊的別集、總集及選集中數數見之，讀者要尋閱絕非難事，茲從略。又《英譯燕子箋》、《泰西群芳名義集》、《沙昆達羅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埃及古教考》及英譯《亞洲和親會約章》六種曼殊譯著，或早已失傳，亦未能如願編刊入集。

曼殊的四種編譯集的初版都在日本刊印，這情況值得注意。今人陳春香在《蘇曼殊的外國詩歌翻譯與日本》中就留意到這情況。陳氏在論文中突顯了曼殊為日本文壇介紹拜倫和雪萊的貢獻，這觀點是值得研究者重視的。曼殊的四種編譯材料，初版均在日本印行，而且印刷也頗精美；事實上1907年前後，日本文壇流行介紹西洋輸入的詩，我特別留意京都大學教授上田敏在1905年出版譯介西方詩作的譯作《海潮音》，《海潮音》收錄了29位詩人57首詩，包括意大利3人、英國4人、德國7人、普羅旺斯1

人及法國 14 人。而曼殊的幾種編譯集，從定名(如《潮音》)以至內容性質等角度看來，都很能配合日本當時譯介西方文學的潮流。

此外，我們也應注意曼殊四種編譯材料與梵學的關係。曼殊的四種編譯材料，都或多或少帶有“梵學”氣息。所謂梵學，廣義而言，是包括梵文、印度文學和佛學。曼殊編譯的風格，與一般的編譯略有不同；他似乎在翻譯之外，尚有推介梵學的動機。以下就四種編譯材料略舉一些證據：

1. 《文學因緣》，“因緣”二字本佛家用語，在命名方面，已是帶著佛教氣息。而《文學因緣》卷首收錄了曼殊譯的“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”，亦與佛教有關。另外，在卷首的九頁畫作中，每幅都與僧人或佛教有關，頁一又有梵文題字一截，而自序中又談到：“衲謂文詞簡麗相俱者，莫若梵文，漢文次之，歐洲番書，瞠乎後矣！”正好說明了梵文的優越性和優美處。

2. 《潮音》，乃由僧人飛錫校錄，由淀江蓮華寺印行出版，在編輯和出版過程中，都跟佛教結下不解緣。扉頁印有曼殊僧裝像和洋裝像各一幅，下署“曼殊阿闍黎獅子國造像”，強調了曼殊的佛教背景。而被擯於集外的《潮音·跋》中，亦強調了《潮音》與佛教的關係：“……仍曰《潮音》，聖哉，響振千古，不啻馬鳴菩薩《賴咤婆羅》，當願恒河沙界，一切有情，同圓種智。”正好說明了編譯